

党史上的群众纪律建设

□ 祝 彦 闫明达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忠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切实加强群众纪律建设，在各个时期和阶段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群众纪律。党史上群众纪律建设的历程与成就经验，对于映照现实、启示未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党的文献来看，虽然在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纪律”一章中，没有专门提到群众纪律，但就广义的纪律而言，当然也包含了群众纪律的相关要求。在革命实践中，“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党和军队开展群众纪律建设的突出表现。1927年10月23日，秋收起义部队为了上井冈山与王佐部搞好关系，防止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于部队出发前，第一次提出了包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在内的工农革命军“三大纪律”。1928年1月4日，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城时，由于部队分散活动，纪律方面出现了一些情况。1928年1月25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毛泽东第一次宣布了包括上甲板、捆稻草、说话和气等内容的工农革命军“六项注意”。毛泽东十分重视群众纪律，据当时担任遂川县委书记的陈正人回忆：“主席很强调六项注意，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严格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六项注意的每句话，都是老百姓的话，非常通俗、易懂。”因为有了严明的群众纪律，工农革命军赢得了井冈山地区老表的拥护支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开辟。1929年1月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期间，群众纪律建设不断加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增加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为了克服艰难局面，更加注重群众纪律建设。比如在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1935年5月19日红军颁布了《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全体指战员“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

有任何的骚扰”“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通过严明的纪律，让各族群众深刻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品质和优良作风。

延安时期，我们党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加强了群众纪律建设。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的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要求全党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群众纪律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并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得到切实贯彻。比如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1947年9月，邓小平在小姜湾村召开会议，颁布“三不准、三枪毙”纪律；同年，在光山县王大湾会议上，邓小平从实际出发，针对部队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制定了大别山版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捆稻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细节上更加严厉。

为了统一军纪，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明确作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损坏庄稼”等规定。各根据地和野战部队根据实际情况又制定了具体的群众纪律，在孟良崮战役期间，部队就规定“老乡不在家，开门就犯法”；华东野战军解放上海进入城区，制定了任何人不得进入民宅的严厉纪律，上演了解放军在上海街头抱枪席地而睡的佳话。正是因为有了严明的群众纪律，以及党和军队干部战士对纪律的自觉遵守，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群众纪律建设面临新的课题和考验。面对少数党员干部滋生骄傲情绪、违反群众纪律等问题，党中央先后开展“三反”“五反”“四清”等整风和整党运动，目的主要就是解决在全国执政之后如何维护群众利益，巩固执政地位，进一

步加强群众纪律建设问题，并对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破坏党的形象的腐败分子予以严厉惩处。

196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期间，鉴于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一些作风不纯、导致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6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规定：“同劳动同食堂”“待人和气”“工作要同群众商量”等，有效纠正了党内存在的脱离群众的倾向，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群众纪律建设的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继续重视加强群众纪律建设。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12条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促进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也促进了党群关系的融洽。1982年9月6日，十二大修改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要求党员“遇事同群众商量，虚心听取并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基层党组织要“经常了解群众对党员、党的工作的批评和意见，尊重群众和专家的知识 and 合理化建议，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为了解决改革开放初期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违反群众纪律问题，198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提出“要从从严治党”，通过严厉整党，群众纪律建设得到加强，很大程度扭转了一时存在的不良风气。1990年3月，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规定：“对严重脱离群众，给工作造成重大损失，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领导干部，要就地免职或给予纪律处分。”通过开展党性党风教育，全党在作风上有明显转变，纪律上有明显增强。党的十六大以来，先后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

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等，对加强群众纪律的制度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党中央的部署，从2005年1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这次活动的成效之一是“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的行动更加自觉，党员干部的作风进一步改进”，因此也是群众纪律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重视群众纪律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实施了一系列重要举措，群众纪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将群众纪律建设融入主题教育中，体现了“润物细无声”的成效，使党员干部在主题教育中不断增强群众纪律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中央先后制定颁布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群众纪律建设不断制度化。十九大党章对党的纪律作了补充，明确党的纪律主要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这是群众纪律被首次写进党章；2023年12月19日在修订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章明确了“对违反群众纪律行为的处分”，其中列举的直接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表现形式、负面清单等内容，都是对党的群众纪律建设的真实写照。

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的征程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群众纪律建设经验。依靠思想建党、理论武装，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为人民谋幸福”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强烈意识；通过各种形式的整风整党、主题教育，将群众纪律建设融入其中，达到对广大党员干部潜移默化的效果；根据各个时期和阶段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规定和纪律，用制度来保证群众纪律的贯彻落实。



东江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坐落于广东省惠州市，建于1984年。纪念碑高16.7米，碑身宽1.8米，底座宽6.4米，碑前有6尊人物雕像，碑后有一面浮雕墙。碑身正面“东江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11个金色大字由聂荣臻亲笔题写。碑座其余三面是铜铸的梅花、苍松、红棉图案，象征着革命烈士的崇高品质和革命情操。碑座正面镶嵌着铜铸碑文，全文如下：

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遍及整个粤东。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漫长岁月中，革命斗争持续不断，革命传统代代相传。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东江地区建立党组织，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有力地支持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第二次国内战争开始后，东江人民举行三次武装暴动，建立了著名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和第四师，英勇顽强，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工农红军第十一军，高举革命红旗，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把土地革命烈火燃遍整个粤东。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和粤东各地游击队依靠群众，团结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威震南疆，蜚声海外。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勇敢作战，为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广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成千上万的粤东优秀儿女在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斗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永远为后人所怀念和敬仰。为中国革命事业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惠阳地区委员会
惠阳地区行政公署 立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

碑文概述了东江地区建立党组织、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等重大事件，生动再现了东江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深切缅怀了献身东江无数烈士的丰功伟绩，读来令人心潮澎湃、深受教育。

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中共东江特委和彭湃的领导下，4月和9月，海陆丰人民先后举行两次武装暴动，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下，均告失败。10月上旬，南昌起义部队1000多人从潮汕撤退到陆丰，与中共东江特委取得联系后进入海陆丰两县交界的朝面山和惠阳中洞。与此同时，彭湃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积极策划准备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10月30日，彭湃率起义部队和海丰当地农军在庵前村举行暴动。几天之内，海陆丰农军与起义部队密切配合，占领了海陆丰两县大部分区乡以及惠阳的高潭区、紫金的炮仔区和五华的部分地区，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11月13日至16日，陆丰举行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陆丰县苏维埃政府。11月18日至21日，召开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海丰县苏维埃政府，通过的《没收土地案》，明确宣布没收一切土地并分配给农民，确定了分配土地的原则、标准和方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规。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农民纷纷起来没收地主、官僚、军阀的财产，烧田契、挖田界、平分土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专文指出：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为“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的苏维埃”。1929年8月，被毛泽东称赞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不幸被捕。在监狱里，面对敌人百般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他毫不畏惧，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于8月30日英勇就义，年仅33岁。

威震南疆的革命斗争

——东江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曾鹏飞 党恒星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相继占领惠州、广州等地。日军登陆大亚湾3天后，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东江纵队的前身之一）成立。同年10月，曾生等回到惠阳县坪山，组建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组织人民抗日武装。1938年12月，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的前身之一）在惠阳县诞生。1940年9月，这两支抗日武装组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宣告成立。

1941年6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在大岭山百花洞村重创前来“扫荡”的日伪军。日军出动飞机向被围困之敌空投粮食、弹药，并前来增兵救援。战斗持续两天一夜，我军毙伤日军50多人。华南日军称这一仗“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1944年5月，东江纵队第三、第五大队和东莞大队，与前来偷袭梅塘乡东纵领导机关的日军500多人，在马山展开激战，毙伤日军近百人。日军大队长加藤敏回樟木头后剖腹自杀。1944年11月，东江纵队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独立第二大队夜袭新塘火车站，歼灭了伪军，摧毁了仓库，活捉了日军站长阿南中佐，致使日军广九线交通中断半月。

东江纵队是抗战时期我们党在广东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是坚持华南抗战的主力部队之一。1945年6月，东江纵队发展为9个支队和4个独立大队、11000余人。抗日根据地从东江向西面扩展，总面积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50万。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东江纵队对日伪军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包括马史等3500余位指战员英勇捐躯，涌现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战英雄黄友、《东江游击队之母》李淑恒等英模人物。朱德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将包括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在内的华南抗日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1949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与闽粤赣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联合发表宣言，宣告粤赣湘边纵队在惠东成立，旋即对东江各地的部队进行改编。为了迅速建立和巩固以东江、韩江为中心的战略基地，粤赣湘边纵队发动春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广东省保安第四师师部和保五团，先后解放龙川、五华、连平等县城。1949年7月之后，粤赣湘边纵队各部队乘胜出击，迅速解放了江南、九连、江北和五岭的广大乡村和10余座县城，解放人口增至400余万，作战部队从初期的470多人发展到后来的3.8万余人，建立了400多万人口、纵横千里的解放区，为解放华南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国

□ 潘敬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苏俄政权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德国的共产党员已号称30万人，法国的共产党也从社会党分离出来，并迅速发展起来。恰在此时，中国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1917年初，蔡元培、吴玉章等成立了北京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从1919至1920年，前后20批约2000名学生赴法。就是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的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旅法早期组织的成立

五四运动后，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相继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党在国内的筹建呼之欲出。1920年，身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任教。临行前，李大钊、陈独秀分别与张申府谈了在海外建立党组织的事，希望他到欧洲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到法国后，张申府随即着手党的发展工作。1921年初，他首先介绍刘清扬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又与刘清扬介绍旅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入党。就在张申府着手在法国建党的同时，赴法勤工俭学的赵世炎、李立三等也成立了劳动学会，之后又在华工和勤工俭学生中成立了华工组合书记部，创办刊物《华工周刊》，通过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初，赵世炎收到陈独秀的来信，信中叮嘱他去找张申府。就这样，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等在巴黎成立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与北京、上海等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一道，共同发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1922年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在德国成立，张申府为书记，赵世炎为法

国组书记。法国的巴黎、里昂、克鲁邹、蒙达尔纪等中国旅法勤工俭学生聚集的城市均有了中国共产党旅法早期组织成员。就这样，中国共产党旅法早期组织像火种一样在欧洲扩散开来。

旅法早期组织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旅法早期组织成立后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是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4月，赵世炎两次给国内去信，表示“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同年6月，赵世炎、李富春、周恩来等18人，分别代表旅法、旅德、旅比的中国进步学生，在法国巴黎郊区布伦森林集会，经过3天讨论后，正式宣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不久，得知国内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是便在10月召开大会，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月获得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春节前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郊外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在赵世炎主持下，经过4天讨论，通过由周恩来起草的章程，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要求入团的团员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会上选出周恩来等5人组成新的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旅法早期组织成立后，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机关驻地办了理论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邓小平是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负责刊物的刻写、印刷和装订。他每天在工厂上班，常常是来不及换下工装，就直接赶到编辑部，经常与周恩来在一起工作。邓小平刻出来的蜡纸既清晰又美观，大家

称他为“油印博士”。面对“国家主义派”的攻击和挑衅，邓小平连续撰写了《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等战斗檄文，以“希贤”的名字在《赤光》上发表。他的文章短小、尖锐、泼辣，像一柄锋利的投枪，有很强杀伤力。多少年后，邓小平仍忘不掉这段岁月。1974年，他率中国代表团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法国停留时特意买了牛角面包，送给周恩来等曾经留法的老战友们。

除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旅法早期组织还参与到实际斗争中。1921年6月，针对北洋政府将中国印花税和滇渝铁路建筑权等卖给法国的出卖主权行径，赵世炎、周恩来等联合中国旅法学生会、华工团体和华侨团体组成拒款委员会，发表“拒款宣言”，号召中法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反对这一肮脏交易。

1922年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同时，国共之间开始合作，中国共产党旅法早期组织积极参与其中。1923年3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举行常年大会，同意加入国民党或与国民党携手合作。此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4年，随着国共合作的发展，大革命蓬勃兴起。国内急需大批干部，中国共产党旅法早期组织先是派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来又先后选送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周恩来等国回。至1926年初，中国共产党旅法早期组织成员陆续赴苏学习或回国，组织活动也逐渐随之结束。

旅法早期组织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旅法早期组织从创立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